

中国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四十年

王 珏 主 编

第 三 卷



中国经济出版社

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40 年

(1949——1989)

第 三 卷

主编 王 珏

中国经济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新安 胡尔湖
封面设计 李贺然
责任校对 胡秀荣

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40 年

第三卷

王 珏 主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海子角胶印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 12.75 印张 319 千字

1991 年 3 月第 1 版 199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3.000 册

ISBN7-5017-0850-9/F·555

(精) 定价 11.50 元

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40 年

(1949——1989)

第 三 卷

主 编 王 珏

常务副主编 杨 宇

副主编 施应麟 仲济生 葛寿昌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 珏 仲济生 杨 宇 张大军 张新安

赵文博 施应麟 胡尔湖 葛寿昌

写作人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 珏 仲济生 杨 宇 张大军 张菊英

张新安 余关福 陈国权 赵文博 施应麟

胡尔湖 葛寿昌 曹国琪

第三卷 序言

本卷所研究的历史时期，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时期。

政治理论上的失误引发了一场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动乱。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人，受到打击、迫害和摧残。许多无辜的人，尤其是大量的知识分子，受尽凌辱和磨难。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倒行逆施，激起人民群众的沉思与愤怒，终于导致1976年“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爆发，继之于同年10月以“四人帮”之被粉碎而结束了这场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的大动乱。

历经10年之久的这场动乱，使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更加成为高度集中的、实行单一指令性计划调节的、完全排除市场机制的、僵化的产品经济。反映在经济理论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作用被否定，党的八大提出的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正确论断被否认和取消，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主张被说成是“唯生产力论”而受到批判，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被歪曲为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总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都被歪曲为“修正主义”而遭到浩劫。

正因为如此，就有必要深入研究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历史。

研究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学史，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这一研究，是深入到学科领域，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挖掘、整理和评述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所遭受的厄运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的研究，将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起到系统地“拨乱反正”的作用，以澄清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一系列基本理论的是非，把颠倒了的历史和理论观点重新颠倒过来；在实践

上，这一研究是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服务的。经济体制改革也是一场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它的理论准备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基本的一环，有赖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给予科学的说明和论证。总结“文化大革命”动乱对政治经济学的浩劫，评论这一浩劫所带来的危害，指明其错误的实质，从而吸取应有的教训，展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貌，这就必然有助于人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来研究和解决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本卷所评述的问题，按照下列十章，有重点地依次加以叙述：

第一章，概括说明“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境况；

第二章，综述“四人帮”经济理论体系的形成；

第三章，评述“四人帮”的基本经济理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二重性”论；

第四章，评述否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商品货币理论；

第五章，评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之被歪曲；

第六章，评述马克思主义物质利益原则之被否定；

第七章，评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理论之被篡改；

第八章，评述经济管理理论方面的主要错误；

第九章，评述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的“闭关自守论”；

第十章，评述“穷过渡”理论破产的历史必然性。

正如本书总序言所指明的，我们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一系列基本理论的发展过程而展开的，因而未免有挂一漏万之失；况且，我们的理论水平有限，要完成学科领域系统地“拨乱反正”的任务，也非我们之力所能及，尚希学术界各位学者、专家共同努力。

1989年2月

目 录

第三卷序言	1—2
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理论境况略述	1
一、经济理论的是非颠倒	2
二、孙冶方、张闻天坚持经济科学理论阵地的斗争	15
三、“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若干经济观点	37
第二章 “四人帮”经济理论体系的形成	47
一、“四人帮”经济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	47
二、“四人帮”经济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	61
三、“四人帮”经济理论的“基本任务”	65
四、“四人帮”的经济理论基础和方法论	78
第三章 荒谬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二重性”论	88
一、“二重性”论的提出及其实质	88
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产阶级权利”不等于 资本主义	103
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不存在资本主义因素	116
第四章 否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	126
一、商品生产“温床”说	127
二、货币交换“土壤”说	134
三、价值规律“异己”说	143
四、商品原则“侵入”说	151
五、否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实质	158
第五章 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歪曲	165

一、宣扬“生产为革命”	165
二、批判所谓“利润挂帅”	174
三、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	184
第六章 否定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关系	200
一、否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仍然表现为物质利益关系	200
二、鼓吹贫穷的社会主义	212
三、批判所谓“物质刺激”，	
否定物质利益的动力作用	224
第七章 对按劳分配理论的篡改	234
一、否定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	234
二、宣扬按劳分配是产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	250
三、鼓吹对按劳分配加以限制	259
四、否定社会主义的工资和奖金	265
第八章 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理论之被扭曲	278
一、对管理二重性原理的篡改	278
二、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理论被搞乱	282
三、企业管理理论被摧残	295
四、对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歪曲	303
第九章 全盘否定发展社会主义对外经济关系	318
一、反对发展社会主义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	318
二、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曲解为“闭关自守”	331
三、“闭关自守论”的历史背景和实质	341
第十章 “穷过渡”理论的破产	348
一、“穷过渡”理论的提出	348
二、“穷过渡”理论的荒谬性和危害性	356
三、“穷过渡”理论的彻底破产	368

附 录	参考资料索引.....	379
	第一部分.....	379
	一、著作.....	379
	二、论文.....	380
	第二部分.....	392
	一、著述.....	393
	二、文章.....	393

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理论境况略述

“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样，在经济领域也未能幸免浩劫。一方面，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另一方面，对科学研究事业实行着所谓的“全面专政”：强令全国几乎所有的学术刊物一律停办；科研机构解散；科研人员下放；许多科研资料也因无人管理而损坏或散失。这期间正常的经济理论研究和教学活动，完全陷于瘫痪或中止状态。正是在这种人为的特殊环境下，“四人帮”和他们操纵的舆论工具，趁机猖狂地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歪曲和篡改。他们鼓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有资本主义因素；否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歪曲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诋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等等。同时，毛泽东晚年的一些经济理论方面的错误观点，被“四人帮”从极左方面加以利用，用来论证他们的“理论”。从而，使本来比较复杂的经济理论问题更加复杂化了。但是，即使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没有屈服和投降，而是和“四人帮”的反革命淫威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这一斗

争中，孙冶方、张闻天是杰出的代表。本章主要就以上内容。从“史”的几个侧面予以略述。

一、经济理论的是非颠倒

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以“最革命”的面目出现，掀起了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极左思潮。这通常是以所谓“革命大批判”的形式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基本原理，被他们篡改和歪曲得面目全非，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上，被搞得是非颠倒，造成了理论上和思想上极大的混乱。

第一，鼓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有资本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二重性”论。

这一观点，是张春桥在一次内部讲话中提出的。^①尔后，在上海编写小组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加以阐明。该书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既有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又有衰亡着的表现为资产阶级法权的资本主义传统或痕迹。”^②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二重性”论。

社会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其他社会关系的性质。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在以唯心史观取代唯物史观，建立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的时候，深知需要打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旗号，否则是很容易被戳穿的。于是，就用“资产阶级法权”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二重性”的一方面的属性，宣称它

① 1972年10月15日和18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召开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座谈会，会上张春桥提出了这个观点。我们将在本卷第二章中对此作必要的说明。

②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76年9月版，第5页。

是“资本主义”，再把它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另一方面的属性“共产主义”“联结起来”，构成一个“对立统一的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二重性”理论就这样被炮制了出来。

1975年3月和4月，姚文元、张春桥相继发表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和《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文章后，经过一年半时间的理论润色，到1976年9月，“二重性”论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理论。这个理论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二重性”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联系起来，又同基本矛盾“始终”要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的理论联系起来，使之达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下面一段文字，是这个理论在总的方面的主要论点：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决不是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如同历史上其他生产关系一样，是一个极其生动极其丰富的矛盾运动的过程。刚刚从资本主义母胎中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一种不成熟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它一分为二，既有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又有衰亡着的表现为资产阶级法权的资本主义传统或痕迹。它们一面互相对立，一面互相联结，由此而构成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运动的特点。这种矛盾运动，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特别是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和执政的共产党内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①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一种“矛盾运动过程”，它是“不成熟”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站得住的。问题在于，如何分析和论证这种“不成熟”性和“矛盾运动过程”，以及如何由此而得出科学结论。人们如果落入“四人帮”设置的圈

①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76年9月版，第5页。

套，秉承“四人帮”的旨意，就会把这种分析和论证寄托在“资产阶级法权”这一概念上。从长远发展的趋势看，“不成熟”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总会向成熟的方向发展。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一点，已为人们所公认。那末是什么构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矛盾运动的对立面呢？按照“四人帮”的观点，就只能以共产主义因素为一方，并以“资产阶级法权”为另一方了，“它们一面互相对立，一面互相联结”，构成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其特点是“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和执政的共产党内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这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二重性”论的基本内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一种崭新的经济关系，虽然它是从资本主义脱胎而出，但它决不包含资本主义的因素。“四人帮”之所以在这里大谈生产关系“二重性”，其目的就是借限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即资本主义因素），达到打倒“党内资产阶级”也就是打倒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目的。

第二，曲解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最终决定力量的原理。

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矛盾，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①“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②又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

① 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

② 同上。

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①毛泽东的上述分析是完全正确的,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被我国理论界所公认。

“四人帮”曲解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否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相互适应的基本方面,否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性,片面强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矛盾的一面,强调不断变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意义,说什么“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始终起着决定作用”,鼓吹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继续革命”。他们还歪曲和篡改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性质和内容。“四人帮”组织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写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运动……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特别是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和执政的共产党内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这样,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矛盾,自然也就是对抗性的了。他们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与调整说成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是和所谓党内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他们以极左的面目出现,鼓吹“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而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放在首要地位,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说成是所谓“唯生产力论”加以讨伐。这就完全歪曲和篡改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和性质,否定了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原理。

第三,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混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资

^① 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

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根本区别，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问题，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重大问题，也是多年来我国经济学界讨论最多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国经济学界基本上接受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的主要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同时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必然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有着本质区别；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有着重要意义，特别是我国原来商品经济不发达，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更为必要；必须自觉地认识和利用价值规律，等等。尽管我国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认识还不全面、不深刻、不彻底，也不完全一致，还需深化和进一步探讨，但确认上述基本观点，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人帮”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问题上，借助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指示中某些提法（本章第三节将进行述评），制造和散布了许多荒谬观点。

首先，竭力抹煞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写道，无论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产品或者还是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产品都“不能不带有某些私人性的传统或痕迹。”^①还说：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并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的商品生产，它决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而且它注定了要和它的货币经济一起共同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的事业服务。可是，历史没有按照这个结论发展。”^②并说“由于社会主义生产还是商品生产，还要实现价值、利润，因

①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76年9月版，第103页。

② 同上书，第104页。

而还要出现产值挂帅、利润挂帅指导下的资本主义生产。”^①这就完全否定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特点，否定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区别。

其次，《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商品经济毕竟是资本主义旧土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重要经济基础。”^②姚文元还说：“商品形式即是货币，货币可以储藏，高利贷就会产生，穷富就会产生，阶级也会产生”^③。“四人帮”的舆论工具大肆宣扬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货币仍有可能转化为资本，变成剥削手段。“由于在按劳分配条件下，人们的货币收入量的不等，因而谁占有货币多谁就占有商品多，并且还为某些人利用货币和货币交换来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提供了可能。”^④总之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存在，那就必然会引起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

再次，他们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要“限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他们既然无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的必然性，混淆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区别，并把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看作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或“经济基础”，完全否定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意义，结论自然就是要取消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第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观，鼓吹“精神决定”论。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物质利益问题，我国经济理论界曾开展过

①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76年9月版，第99页。

② 同上书，第106页。

③ 转引自《经济研究》1978年第2期。

④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76年9月版，第343页。

多次讨论。由于“左”的观点影响，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长时期以来存在着忽视物质利益的倾向，例如不注意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适当地改善人民的生活，不注意人民群众当前利益和个人利益，不适当地夸大精神的作用。在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张春桥发表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否定社会主义物质利益，离开物质利益片面而强调政治思想教育，在当时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后来在国民经济的调整时期，人们不得不重新考虑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问题。我国经济理论界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本质上仍然是物质利益关系，满足人们物质利益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内在动力，必须按照列宁的论述，把整个国民经济建立在个人物质利益的关心上，坚持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实行政治思想教育与物质鼓励原则相结合，正确地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物质利益的关系。尽管1964年后，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弦越绷越紧，“左”的观点又有新的抬头，但并未动摇坚持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的基本观点。这也是我国当时社会主义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凡是正确坚持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劳动热情就高涨，社会主义建设就顺利发展；反之，人们的劳动热情就受到挫伤，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受到影响。正因为如此，坚持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

“四人帮”否定劳动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达到了十分猖獗的地步。其一，曲解社会主义物质利益的性质，丑化物质利益原则，把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称作是“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早在1958年张春桥就在他那篇《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文章中把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说成是“钱能通神”的金钱拜物教。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又大批所谓“物质刺激的修正主义路线”，物质利益被说成是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